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六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三五期 ——  
(二〇一〇年一月十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001c)

|        |               |     |
|--------|---------------|-----|
| 【文革公案】 | 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的前前后后 | 李幼华 |
| 【知情者言】 | 江青对身边工作人员心狠手辣 | 杨银禄 |
| 【史林一页】 | 百问九一三（五）      | 舒云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文革公案】

李仲公上交贺龙信的前前后后

• 李幼华 •

我是李仲公的女儿。现旅居德国，为德籍华人。李仲公与贺龙过去历史舞台上的一段小插曲，而今却变成了一个大话题。现在，中国大陆境内的许多报刊杂志及网页上，均可以看到“贺龙受害始末”、“李仲公为什么诬陷贺龙”之类的文字。近年来，我清理父亲留下的笔记、文稿之类的遗物，加上我对这一事件的亲闻亲见，并走访了一些健在的当事人，有必要站出来说一说这件事情，作为一面之辞公诸于众，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

父亲李仲公是贵州贵阳人，十八岁考入北京法政学堂。1913年底受汤化龙、孙洪伊进步党资助，与李达钊等人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担任教育部编审员、众议院首席秘书，与李达钊等人共同创办《晨钟报》。1918年应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之邀回黔，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赞和贵州政治会议委员，参加过护国、护法诸运动。1922年。父亲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完成早稻田大学学业。此时。父亲胞弟、我的五叔李侠公正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父亲与黔籍学生周逸群（日本庆应大学学生）、毛景周（日本士官学校学生）等人结识。1924年2月回国参加国民革命，东征时担任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与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共产

党人周恩来共事交往。

1926年7月，父亲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蒋介石出师北伐进驻长沙之际，贺龙由湘西遣派毛景周到长沙面见父亲，请求收编，给予名义和款械，随从北伐。此时，父亲负责分化吴佩孚系袁祖铭部黔军工作，贺龙时为袁祖铭委任的旅长。在父亲的眼里，贺龙还是一位由“土匪”起家分投于川黔地方军阀的“土军阀”。为了分化袁祖铭势力，扩大国民革命军阵营，加上有同乡好友毛景周的“疏通”，父亲遂向蒋介石进言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师长，并向所部拨发补给和枪弹，毛景周因此担任了贺龙师教导团团团长。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打下武汉后，贺龙在武汉以感激的心情亲自拜见了父亲。

1927年3月，国民党宁汉之争正烈，父亲的态度是既不赞同蒋介石绝俄反共，又不赞同邓演达、唐生智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倒蒋，企图维护北伐团结统一局面。当时，蒋介石深知父亲的思想，遂令父亲率领秘书处随中央党部迁汉，也好为他作一些“缓冲”工作，但有关反共的右派活动均交由秘书处机要科长陈立夫专管，不使父亲与闻。而父亲此时的身份是总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书记长，汉方均认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这时，贺龙的部队驻扎在九江、汉口之间的武穴，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准备出兵讨蒋之际，贺龙因受到唐生智“你帮我们打蒋还是帮蒋打我们”的威胁，就用“计捕李仲公”来取信于武汉政府，保全他的部队。3月13日，父亲在汉口泰（或“秦”字）晏里川军驻汉办事处邀约朋友吃饭，也邀约了贺龙和他的秘书长、父亲的贵阳同乡严仁珊。贺龙借此向唐生智密报说李仲公在川军驻汉办事处召集西南在汉师、旅长和川黔军代表开秘密会议，策动刘湘领衔反对武汉中央，并由川黔出兵讨伐武汉等情形。唐生智将此情况上报武汉国民党中央，由谭延恺召集中央“临时会议”，同邓演达、徐谦等人商讨办法。由于徐谦力主拘捕，决议将父亲“暂予扣留”。交唐生智执行，唐便将此任务交贺办理。3月15日夜，贺龙邀约父亲到他的办事处“宵夜”，遂将父亲押交唐生智总指挥部拘留，直到4月17日始由邓演达保释出来，邓将原委告诉了父亲。

1929年（或1930年）春夏间的一天，已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父亲在南京交通部接待了一名持有贺龙信件的“密使”，父亲看完来信后，将信留了下来，来人要求回信而受到父亲的拒绝。随后，贺龙又两次派人送信而要求回复，均遭到父亲的拒绝，将来信扣留下来，没有转报蒋介石。后来父亲在国民政府内历任招商局总办、安徽省教育厅长、贵州临时行政特派员、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发起，从事反蒋爱国民主活动。

国共和谈破裂，父亲仅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而拒绝国民党当局南逃之命，由南京秘密潜回苏州隐藏起来。1949年6月，父亲在苏州接到郭沫若北平来信：“仲公兄：赐信奉悉，已将原函转致恩来。待有好音，再行奉报。专复，顺颂暑安。弟郭沫若顿首。六、二十”。7月，父亲与卢郁文等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了起义宣言，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国民党政权。8月父亲自苏州赴北平，周恩来拟安排父亲待西南解放后去西南工作。1950年7月周总理安排父亲担任政务院参事，而安排已任政务院参事的五叔李侠公回西南担任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民政厅长。父亲在北京，分别应周总理和郭沫若之邀，两次与贺龙在饭桌上相见，见面握握手，礼节性的打招呼而已，没有直接交谈过。后来贺龙托人送过一件獭皮大衣给父亲，他一直穿到去世。他曾几次和我说：“这是贺龙送给我的。”

## 二

在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参事室，父亲担任过西南区组召集人、学习组长，兼任国务院法规编审委员会委员，参加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讨论起草工作。1957年，父

亲作为中共“反右”斗争的“马前卒”，常参加高级国务会议。1959年7月，父亲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动员参事们积极撰写文史资料。此时，有一位叫李奇中的参事经常来我家与父亲交谈，后来才知道他俩合写了一篇《袁祖铭被杀内幕》的文史资料。也许是父亲在与李奇中关于袁祖铭所部的交谈中，无意识地把他与贺龙的关系及贺龙信的事情吐露出来了。

根据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贺龙传》记载，1967年1月20日，贺龙和夫人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9月被正式立案审查了。北京城内到处都有“打倒走资派贺龙”等大字报。1968年3月，参事室多次举行座谈会，号召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贺龙的历史问题被重点提了出来。从1968年2月29日起，中央专案组就派人到我家中向父亲了解贺龙历史上的问题。专案组每次都是两人一道来的，穿军装者为多。根据父亲留下的参事室《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来人有由学柱、周栓增、李德儒、刘士兰、朱延忠等等。专案组开始对父亲很客气，有礼貌，要求父亲配合，后来的一批人对父亲说话就不客气了，威逼父亲交代贺龙历史上的“叛变”问题，并追逼贺龙的信。父亲一直都说“原件已被爱人吴澄华在苏州烧掉了”，只能告诉大概内容。父亲与专案组调查人员的谈话是在我家客厅，有时从上午一直磨到下午，许多时候保持沉默，无话可说，相视而坐。我的姐姐李绍华到中午还给他们煮过面条吃，搞得家无宁日，这样僵持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有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吃饭，进门后我看见一根擀面杖不知为何斜立在走廊墙边，专案组的人和父亲在客厅里谈话。当时我因为听见有客人在，马上意识到他们又来了，就没再去想。专案组的人起身“告辞”，我和母亲走在他们的后面送到门口，回过头来我看到走廊墙边立着的擀面杖已不见了。我将此细节告诉母亲吴澄华，全家都很紧张，认为专案组要对我们家下“死手”了。同时，一位调查人员与父亲对坐，另一位就到我家中每个房间查看，我母亲只得跟在他身后满屋子乱转。他们并对父亲说“再不交出来，我们是有权力抄家的”，父亲一直不清楚信到底还在不在，本来就没想理睬这件事，所以也没有去找。这时，我们也不得不找了，否则抄家找到就很被动了。于是我母亲、姐姐和我三人翻箱倒柜，把家中的各个角落都认真地翻了一遍，在父亲的一堆旧文件书报中，终于翻出了署名“贺云卿”的两封信，全家都呆了。

贺龙的两封信找出来后，我们叫父亲马上交出去，父亲说：“你们不懂政治，再说交出去别人会认为我是在落井下石报复贺龙，让我再想一想办法。”假如父亲当时将找出来的信一把火烧掉，也不会出现最终“身败名裂”的结局了。我父母经过几天的思量，决定交由周总理来处理是最好的选择了，也认为总理是很了解父亲的为人和贺龙的历史的。为防后患，母亲叫我姐和姐夫王树珍找来照相机把信拍照下来，因不懂照相技术，冲洗出来完全看不清楚，放在家中的书桌上好几年。如何才能将贺龙的两封信送到总理的手中呢？父母想到了可以信任的参事室工作人员秦萍和张云，认为他们一定有办法万无一失地将信送到总理的手中。1968年3月29日，父亲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由参事室送出。贺龙的两封信原件，最后由张云、秦萍与周总理的联络员郑凯取得联系后送出去的。后来，这两封信被中央专案组认定为贺龙叛投国民党的重要物证。

贺龙写给李仲公的这两封信的内容，根据父亲留存下来的抄录件是这样的：“（一）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此被严仁珊等之欺骗，既予兄之难堪，复陷龙于绝境，至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去、今屡拟托熊贤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解释，藉明心迹，终以山河阻隔，音问无由，恁恨事也。近阅报章，始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余不一一，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正式派人晋京面候教益矣。手此。敬叩勋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十六。（二）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函计达，十六年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

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耶？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爱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禁依依，此叩大安。弟贺云卿亲笔上，五月二十六日。”根据父亲留下的致周总理信的底稿。内容是：“久未谒见，时在念中。兹有一事，我手中有贺龙在1929年由湘西派人到南京要求我代帮助向蒋投诚的两封亲笔信，是这个大叛徒叛党的铁证。如由信内送上。虑交不到落入别人之手。拟请于万机之时召见片时，当面奉呈，并补陈有关情况，亲聆教导。特此函达之予核裁。敬祝健康，并致革命的最后敬礼！1968年3月29日。”

信送出去几天后，周总理办公室来了一个人到我家中，很客气地说：“感谢仲老对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总理已收到，总理让我们转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体！”根据来人的语气，不像是专案组的那帮人，一定是总理派来的人。父亲知道总理收到贺龙的亲笔信后，相信总理一定会妥善处理的，一颗悬着的心也就落了下来，清静了一段时间。

中央专案组如何知道李仲公手里的亲笔信的呢？父亲一直没有弄明白。最近，我由德国第一次赴贵州给父亲扫墓，并转道北京看望了秦萍等老人。闲谈中，秦萍老人直心快，向我讲述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并说知道贺龙写给李仲公亲笔信的只有李侠公和李奇中两人，她的猜测有可能是参事室参事李奇中说出去的，李仲公因此“脱不了手”。

### 三

在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的过程之中，中央统战部多次把父亲叫到统战部落实贺龙写给他的信件问题。父亲回到家中很气愤地说：“童小鹏要我承认那两封信是假的。”父亲当即作否认，坚持贺龙的“亲笔信”是真的。并对童小鹏说：“你说信是假的，难道是我李仲公造的不成？”童小鹏说：“不是说你造的，如果是有人假借贺龙的名义写的，你也不知道。”现在想来，是不是提示李仲公肯定是“别人假冒贺龙的名义写的”，给李仲公一个台阶下，可恨李仲公又臭又硬罢了。

周总理逝世后，父亲知道没有人保护他了，已预感到不知那一天会受到处理。1978年5月12日，父亲生病住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至6月20日去世，住院四十天。父亲住院期间，参事室派人到医院向医生了解父亲的病情，问“有救没有？”医生说“年纪大了，危险！”这些对话都是我们在医院的走廊上听到的。还交代我们“如果李仲公不行了，无论白天晚上，无论几点钟，一定马上通知参事室”。之后的一天，参事室通知李仲公的亲属在家等候领导上宣读重要文件。要求直系亲属不得缺席。当天，我母亲、姐姐和我在家中等候指示，参事室副主任白光涛和一位工作人员到我家中宣读了《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说：“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是李仲公伙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十，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八十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对父亲的处理决定，我们见父亲病重没有告诉他。因此，父亲到死都不知道他的“罪状”。20日早上6点30分父亲去世，9点参事室召开会议向参事们传达对李仲公的处理决定。父亲逝世时享年92岁，其骨灰最后由我的母亲送回贵阳老家安葬了。

父亲当年交送周总理的两封贺龙信，在当时要为贺龙彻底平反的政治环境中所作的“鉴定”是值得怀疑的，“原件”还在吗？也许将是一桩历史“悬案”了。我的父亲（一个十足的书呆子）连半导体收音机都不会开用的人，文革开始，亦没有和任何人有什么交往。年过八旬他如何能够伪造出两封信？他与贺龙的这点交往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恐怕算不上什么大事。现在看来，

贺龙当年秘密致信李仲公，是在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所采用的一种斗争策略，以减轻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压力，谋求革命队伍发展空间，不能就说他有“叛投”国民党反动派之意，也不影响他对中国革命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没想到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政治上的致命“软肋”，“叛投国民党”的所谓“铁证”。

父亲从政多年，看见并经历过许多政治斗争，只有政见上的分歧，不存在个人恩怨，诸如他对待蒋介石先生的态度。父亲作为蒋介石北伐时的文胆谋士，最终因政见不合而分离，但人格上是敬重的；作为中共政权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诚心诚意膺服中共的领导，在中共“反右”斗争中充当了“马前卒”，在中共的内部斗争中成了“牺牲品”，他与贺龙的结果都是以悲剧而告终，值得后人深思和借鉴。

今天，看到我的祖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治民主，民富国强，我们这些海外中华儿女由衷地感到自豪，都不愿去回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历史是值得人们借鉴的，理智地尊重史实，才能有效地对后人起到借鉴和教化作用。我们不能忘记先贤“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箴言啊！

□ 《文史天地》2009年第11期

~~~~~

#### 【知情者言】

#### 江青对身边工作人员心狠手辣

• 杨银禄 •

江青对身边工作人员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比如，她把她的首任机要秘书阎长贵（在职时间1967年1月9日——1968年1月9日）打成“坐探”投入监狱关押8年，这是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里我再举几个例子谈谈这个问题。

#### ◇ 刚刚下葬要扒坟

1968年1月2日，我调任江青的机要秘书没多长时间，突然接到老家“父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

我看过电报，归心似箭，真想请个假回去看看，亲自伺候伺候已经70多岁的老父亲。等我冷静下来以后，心想，组织上信任我，把我派到这里工作，工作还未熟悉就请假回家，实在难以开口。于是便默默地把电报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没有向任何人讲，把难过和焦急不安的心情埋在心底。

第二天，我又接到“父病故速归”的加急电报。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怎么也控制不住难过的心情。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阎长贵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后，同情我，安慰我，并立即打电话请示汪东兴（因为江青已经睡觉）。汪东兴考虑我调到江青处工作时间不长，还没有正式和江青接触，阎长贵还没有走，江青有什么事都由他处理，她不会找我处理什么事情，我回家的事无需报告江青。因此，也就同意我回家去料理老人的丧事。

汪东兴批准我回老家以后，阎长贵派人替我买了火车票，又派车把我送到火车站。我就这

样急急忙忙回到了老家。到了家，我直奔父亲居住的南屋，一进房门就看到骨瘦如柴，面色蜡黄，直挺挺地躺在门板上的老父亲。我大步跨到父亲的遗体旁，抱着他的头大哭起来，全家人也跪在地上大哭。我回去的第二天，就把父亲埋葬在我家的祖坟。

父亲的去世，使我极度悲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时我患了急性胃肠炎，上吐下泻，发高烧，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原本想掩埋了父亲就立即回京，可是我病得不能动弹，无法马上回京，只能躺在炕上养病。

第四天，中央办公厅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干部科的干事毛尚元到我家催我赶快回北京，并带来汪东兴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杨银禄同志，你的岗位工作很重要，需要你马上回京，今特派毛尚元同志前去接你。”

当时，我上吐下泻还没有止住，高烧还没有退下来，身体十分虚弱。老母亲不愿意我马上走，想叫我再守她几天。经过我和毛干事耐心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她老人家同意我走了。她说：“在外边工作，身不由己，还是国家的事是大事，既然我把你交给国家了，忠孝就不能两全，快点回去吧，不能为了家里的事，耽误国家的大事。”我听了老人的话，想马上走，可是我站不稳，走不动，况且我的家离定县火车站有45华里，那时我家又没有自行车，怎么到火车站呢？还是毛干事有办法，他从当地驻军38军要了一辆吉普车，当时，定县的群众分两派，形势比较乱，部队的领导怕我们不安全，车上一位干部腰挎手枪，一位战士手持冲锋枪，把我护送到火车站，我们便回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毛干事把我送到了汪东兴的驻地。

我两腿发软，心发慌，一走进汪东兴的会客室就昏迷过去了。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见此状，立即叫来医生，给我打针，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醒来以后，发现汪东兴坐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你父亲的后事处理完了吧？你父亲刚刚去世，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呢？因为你回家前，王力、关锋出了问题，被隔离审查了，江青同志可能怀疑她身边有不可靠的人，才叫你立即回北京，你如果觉得身体好些了就赶快回钓鱼台工作，她急切地等待你回去。”

经过医生的治疗，我休息了一会儿，又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上轻松多了，就回到了钓鱼台。

我回到北京以后，就发生了阎长贵“出差”（实为“隔离审查”）的事件。

阎长贵是1月9日被隔离的，1月10日下午两点钟左右，江青起床以后，打铃叫我，我听到铃声，就小心翼翼地走进她的办公室。

她说：“我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有一个保险柜，柜子里有一档（一格）文件，等我休息的时候，你给我取回来，那些文件都很重要，不能搞丢了，也不能搞乱了，我说的你记住了吗？”

我对江青的交代和问话用部队的习惯用语：回答道：“记住了，江青同志还有什么指示？”我说完了，准备起身离开，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讲话的声音不能小点儿吗？速度不能慢点儿吗？你讲话跟打机关枪一样，我受不了哇！对这个规矩，你必须记住！”

我小声说：“好！”

我参加工作10年，虽然远距离地见到过不少中央领导，可是，如此近的距离和如此大的人物谈话，还从来没有过，但我却丝毫没有幸福之感，只是感到心情十分紧张。

回到办公室，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感到内衣湿漉漉的。我脱掉外罩绒衣一看，衬衣、背心全被汗水浸透了。

1月11日，江青正在吃午饭，我听到打铃声，这是她叫我。我进入她的餐厅，见李讷端坐在餐桌的旁边。我没有看见江青的表情，就低声慢语地问江青：“您叫我，是不是让我在您午休的时候去中南海把那些文件取回来？”

我站在她旁边等了大约一分多钟，没有听到她说一句话。这时，我觉得有些奇怪，就注意了一下她的表情，发现她的下巴往前伸着，嘴唇打着哆嗦，紧接着便咬牙切齿地大声嚷道：“谁叫你去取文件？我问你，你前几天回老家干什么去了？”

我说：“我父亲去世了，经请示汪东兴同意，回去料理丧事去了。”

江青听了我的回答，大声地说：“你父亲去世是假的，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是戚本禹、阎长贵他们把你支走的，他们好干坏事……”

我听江青这样说，就忙解释说：“别人做什么事情我不清楚。我父亲真的是去世了，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的毛尚元同志调查，是他到我老家把我接回来的，我父亲是真去世还是假去世，他是清楚的。”

江青听了我的解释，认为有损她的威严，大声吼道：“你在撒谎！我现在就派人到你的老家把坟墓扒开，看看尸体是不是你父亲？如果不是，看你如何解释？如果不是你父亲，你就犯了欺君之罪！”

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把一双筷子狠狠地往饭桌上一摔，其中一根筷子反弹起来落在地板上。她双手叉在腰间，用更高的声音狂叫：“你，你刚刚来我这里，就敢跟我顶嘴，以后还了得，你给我立即滚出去！”

我的心情紧张极了，只觉得两腿在打哆嗦。这时，我盼望李讷替我说几句解围的好话，李讷只说了句：“杨秘书，不要着急，有话慢慢说。”她母亲的地位那么高，权力那么大，她能说什么呢？江青下令叫我滚，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我含着泪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躺在床上，难过极了，我失声痛哭起来。

面对着天花板，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的父亲一生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解放前，他给地主扛长活，逃荒要饭，受尽欺压和剥削。解放以后，我家分得了土地，日子应该好过一些，可是，我有4个姐姐，虽然3个姐姐先后出嫁了，家庭负担仍然很重。父母亲省吃俭用，把我哥哥、我弟弟和我送进学校读书。他们盼望我们将来有个出息。当时弟弟还小，母亲身体不好，全家6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人劳动，日子过得很艰难。平时没有好吃的，就是偶尔有一点点，也是让给年小的弟弟和多病体弱的母亲。

父亲劳动强度大，肚子吃不饱，不到60岁，腰就挺不直了，一到冬天，气管炎发作，彻夜不停地咳嗽。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忠厚朴实，勤劳善良，再苦再累也任劳任怨。他脾气特别好，从没有打骂过我们。我们对他老人家特别敬重，很想孝敬他，但是又苦于没有经济能力。我参加工作以后，离开家乡，更没有机会孝敬他。他离开人世之前，我也没有在病床前守候，没有说上一句安慰话。他病重时，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想在断气前见我一面，但没有如愿。我深深感到很对不起父亲，越思越想越悲痛。

身为中央领导人的江青，对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亲人去世，非但不表示任何同情，不予安慰，还扬言派人扒坟验尸，我真感到到她来这里工作真是进错了门，认错了人。

我越想越感到委屈，越想越觉得气愤。于是从床上爬起来，打电话给汪东兴，想把心中的苦闷向他倾诉。我说：“汪主任，请你赶快来吧，我在这里干不了啦。”

汪东兴急忙问：“出了什么事啦？”

我一边哭一边说：“在电话里说不清楚，你来了以后就知道了。”

没有等多长时间，汪东兴就真的来到了钓鱼台11号楼。

汪东兴来后，我的情绪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但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刚才发生的事，向他诉说了一遍。我说：“这里的工作我干不了，一是我没有能力干秘书工作；二是我不适合在她这里工作，她不信任我，没法干；三是我受不了这种窝囊气。你快点叫我回去吧。你不是说过，不适应这里工作再回警卫团吗？……再说，她不是叫我滚吗？我滚就是了。”

汪东兴听了我的诉说，脸上出现比较复杂的表情，他说：“她叫你滚出去，是叫你赶快离开她的餐厅，并没有说她不用你了。我现在还不能把你带回去。我跟她谈谈，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她用你还是不用你，如果她的确说不用你了，我再把你带回去也不晚。”

汪东兴等江青午睡起床以后，来到她的办公室，一个小时以后，汪从楼上下来，对我说：“她是怀疑戚本禹、阎长贵欺骗我而把你支回家去了，我已经跟她说清楚了，你在这里再干一段时间试试，如果实在不行，她又的确表示不再用你了，你再回中央警卫团。”

我用信任的目光望着汪东兴。他又劝导说：“批评是动力嘛！要经得起批评嘛！”

“有她这样批评人的吗？太伤人的感情了。”我生气地说。

“算了算了，在她面前有什么理可讲嘛。”汪东兴显然是不让我再说下去了。汪东兴是我的上级，我认为他的话也有道理，于是我就轻声地说：“那就听你的吧！”

#### ◇ 江青最嫉恨护士结婚

1967年国庆节后，组织上为江青从军事医学科学院调来一位女护士，叫周淑英，江青和我们都叫她小周。

周淑英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庞，健康的身体，大而有神的眼睛。她爱说爱笑，留着一头标准的军人短发，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她出身于贫民家庭，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根红苗正，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为能调到中央机关工作而感到光荣，凭着一种光荣感和责任



感，尽心尽力地工作。

江青醒着的时候，小周伺候她吃饭、吃药、喝水、吃水果、按摩、打针、洗澡、刷牙、换衣服，跟着她出去开会或活动；江青睡觉以后，小周还要为她洗衣服、熨衣服、测气温、看风向……繁重的工作和严重的睡眠不足，使得小周疲惫不堪，没过多久就变得面黄肌瘦了，活泼的神情不见了。她即使是到了那个样子，还是强打精神，硬撑着坚持工作。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感冒发高烧，小周废寝忘食地精心护理她。晚上江青睡在床上，小周就坐在地板上守候，在漆黑的屋里既不敢打瞌睡，又不敢弄出任何声音，苦苦熬了一夜又一夜，白天还照常工作。江青平时就好出汗，发烧时出汗更多，稍出一点汗，就叫小周换内衣、换被子，把换下来的被子立刻抱到外边晾晒。有时来不及晾晒就用电熨斗熨干，准备了6条被子都倒不过来。就这样，小周5天5夜没有怎么合眼。有一次她给江青送饭时两眼睁开不开，两腿迈不动，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向前挪动。有好几次摔倒在地，昏睡过去。我们看在眼里，心疼得直掉眼泪。

1971年，小周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有一天，她对我说：“老杨，我找了一个对象，我们打算最近准备结婚，现在江青同志身体比较好，我想这几天抓紧时间办事，最多请五六天时间的假。我不敢跟江青同志说，拜托你跟她说，她同意，我们就办；如果不同意，再拖一拖，没有关系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婚女嫁是人生的大事，小周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想任何当领导的都会支持并表示祝贺。但是，江青这个人与常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她最嫉妒别人结婚。我想，对这位护士的结婚请求，江青同意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一天下午1时许，江青起床后，吃了麦片，到办公室办公（她睡了一大觉，起床后是一天中情绪最稳定的时候），我去向她请示小周要求结婚的事。

没想到，江青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说：“那好哇，这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成人之美嘛，向她表示祝贺！”

江青放下手中的文件，又问道：“什么时候结婚？请几天假？”

我说：“您同意了，她想最近几天就结婚，准备请五六天的假，办完了事马上回来上班，她不想过多耽误工作。”

江青说：“结婚是终身大事，多休息几天没有关系，我现在身体还可以，结婚很累人，多休息几天。”

我高兴地说：“我代她谢谢江青同志。”

江青说：“你叫她到我这来一下。”

小周来到江青的办公室，江青当面向她表示祝贺，并送给她两块布料，作为结婚礼品，小周很受感动。

当小周离开钓鱼台的时候，江青突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大发脾气了。

她的下颚往前伸着，嘴唇打着哆嗦，厉声厉色地说：“这个小护士，她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在我精神、身体都不好，正需要她的时候，居然离开了我，结什么婚？在她的心目中，一个男人的地位和分量，比我这样一个政治局委员还重要。为了革命工作就不应该结婚，不应该生孩子！你们告诉她，她既然走了，不管我了，伺候她的男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守着她的男人去吧，我不想再见到她！”

那时，由于通信联络不方便，对江青后来的态度我无法告诉小周。小周后来还是没有逃得了厄运。

我记得1971年11月份，江青突然提出叫小周到中央办公厅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小周到了五七干校不久，江青又指使一位也是政治局委员的大人物把小周押送回京。

当时汪东兴劝那位大人物不要按照江青的意见办，否则将来会被动的。那位大人物说：“这是首长交代的事，一定得照办。”

汪东兴说：“你一定要坚持按照江青的意见办，你就给我写一个收条，说明你已按照江青的意见从中办把小周带走了。”

这位大人物按汪东兴的意见做了，现在那张收条还在汪东兴那里。

小周一到北京，就被送到西山某处，被关进一间小房子里，窗子用木板钉死，还专门派了两位女同志“负责她的生活”，大小便都由两位女同志跟随到厕所，可怜的小周从此就失去了人身自由。

小周被突然的打击搞得糊里糊涂，她在那间黑洞洞的屋里大声问看守：“我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把我单独关在这间房子里，不能自由行动？这里是什么地方？”

那两位看管小周的女同志，其中有一位很同情小周，对小周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你好好休息，保全自己，将来会搞清楚的，你千万别做傻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周仍不见什么动静，急了，大声疾呼：“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把我不明不白地关在这里？如果一个人犯了罪总得审讯吧，为什么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问我。”

小周这样一闹腾，惊动了公安部副部长于桑。

于桑问了小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1969年6月，你跟随江青到上海，一天早晨江青起床以后，你在江青的卧室拉开了几扇窗帘？看到什么了？另一个问题是：1970年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住在哪儿？林彪住在哪儿？

小周认为这两个问题问得莫名其妙，便说：“在上海时，江青的卧室拉开几扇窗帘，要看时间的早晚，天气是晴是阴以及江青在不在卧室而定。天气晴朗就少开几扇，天气阴就多开几扇；江青在卧室就少开几扇，不在卧室就多开几扇。多开几扇或少开几扇窗帘还会有什么问题吗？至于在庐山，毛主席住在什么地方，你去问汪东兴、张耀祠同志，我知道也不能讲，这保密。林彪住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去过，不知道。”

天真无邪的小周哪里知道，问的两个问题正是江青诬陷小周是林彪的特务的两条罪状。

于桑听了小周的回答，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了。

1969年6月，在上海。一天中午，小周伺候江青起床时，按惯例顺手拉开一扇窗帘，这时有两个哨兵巡逻，从窗外走过去，小周并没有注意到那两个哨兵。江青却犯了疑，当天下午，江青叫我打电话把张春桥叫去。江青问张：今天中午有两个人从窗外走过去，是什么人？

他们有什么企图？查清楚立即告我！

第二天，张春桥到江青的住地报告调查结果：“昨天中午从你窗外走过去的那两个人是保卫你安全的两个哨兵，没有发现什么不轨行为。我已告诉他们，以后哨兵巡逻时，不要离你的窗户太近，以免影响你的休息和办公。”

当时江青相信了张春桥的调查，以后再也没有提起此事。

两年过去了，林彪出走，江青又提起那件事，硬说那天是小周和空4军联系好的（空4军是林彪集团成员王维国领导的部队），趁她起床拉开窗帘之机企图用枪打死她。

1970年在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有一天，小周同两位工作人员，趁江青休息时间，到离江青住地只有200多米远的小卖部买了一袋牙膏和一块的确良布，来去只有十几分钟时间，不料被“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和王秀珍看见了，他们便向江青告密说：怀疑小周在庐山期间到林彪的住地去过，给林彪通风报信。

这两件事情原来有这样的背景，任凭小周多么聪明，绞尽脑汁也想不到这样复杂。

又过了几个月，对小周的“问题”没有人问津，小周忍不住了，又大哭大闹一顿。果然惊动了前面提到的那位大人物。他去了以后，对小周慢条斯理地说：“听说你闹得很厉害，是怎么回事？”

小周趁这个机会诉说了自己无处诉说的心里话，她说：“我给江青当护士时，尽心尽力地为她服务，努力工作，我对党是问心无愧的，我对江青也是问心无愧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那位大人物听了以后说：“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相信党嘛，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

这时，小周看见那位大人物的警卫员小高也在一旁，便提高了嗓门：“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党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任何时候都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冤枉任何人。”

小周故意提高声音，是想让那位大人物的警卫员听到，好让对方把自己关押在什么地方的消息传出去，以唤起曾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同情，替她说话，为她申冤。

我们和小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对小周的不幸遭遇愤愤不平，同时，也感到人人自危。我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如果继续在江青处工作，谁也逃脱不了跟小周一样的下场。我们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惧，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想寻找机会发泄发泄。

终于有一天，汪东兴到钓鱼台10号楼办事，我们几位工作人员拉住他，不让他走，请他听听我们的意见。汪东兴只好坐在小会客厅耐心地听大家发言。大家纷纷问道：“小周有什么罪？为什么那样对待她？小周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也不在这里干了。”

汪东兴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说：“小周究竟有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我了解一下，你们别着急，她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

汪东兴回到中南海以后，把小周的事，向毛主席报告说：“我刚才到江青同志那里去了一下，那里的工作人员的心情不平稳，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毛主席问：“为什么？”

汪东兴说：“江青同志原来有个护士小周，被隔离审查了，江青同志怀疑她有问题。江青同志那里的工作人员证明小周是个好同志，没有任何问题，纷纷要求把小周放出来。”

毛主席听了汪东兴的汇报，很生气，立即指出：“江青不应该无根据地对待一个孩子，从哪里抓起来的，还放回哪里去！”

1973年初夏，我们听到小周被释放的消息，十分高兴。但是，没有过多久，我与和我在一起工作的江青的警卫员周金铭，也被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被送到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干校劳动。

到了五七干校以后，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大周到小周所在的连队（小周是从五七干校抓走的，释放以后又被送回五七干校）去看小周，小周看到患难与共、久别重逢的战友，像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我们两位男子汉也禁不住地哭了起来。我们既为小周的获释而高兴，又为小周的不幸遭遇而难过。

小周后来流着眼泪对我们说：“关押我的时候，有两位女同志，其中一个对我态度比较好，另一位对我态度不好。她经常对我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不要走向党的反面。’我对她说：‘我没有问题，你叫我交代什么？我这个人永远也不会走向党的反面。我始终是忠于党，忠于党中央，忠于毛主席的。’当时，我觉得太冤枉了，太难过了，真的不想活了。我结婚时，江青送给我两块布料，一块蓝的一块灰的。我看到这两块布就气得不得了，我用一条蓝头巾包得好好的给江青退了回去，凡是她的痕迹我一点儿也不留。不知道为什么，我退给江青的布料、头巾，又给我退了回来（文革结束后，汪东兴对我说：小周退给江青的东西如果江青收到了，非更加激怒江青不可，江青一定会往死里整小周，所以，我又把东西退给了小周，这也是为了保护小周，免受更加残酷的迫害）。当我看见又把东西退了回来，一气之下，拿起剪刀把布料剪了个粉碎。”

小周说：“当时我是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申呀！我真的想一死了之。我的情绪坏到了厌世的程度了。我房里有绳子，不想再活在世上了。后来我又想，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组织，相信党中央，如果我死了，真的就说不清了，我终于还是活下来了。”

#### ◇ 宠物比人更金贵

“九大”后江青对养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先是养了一只大狼狗，起名大黄。后来又养了一只小黄狗，她给它起名叫“小黄”。那段时间江青真是爱狗如命，玩狗入魔，命令工作人员定期为小狗洗澡、梳毛、洒香水。“小黄”的名字只能她一个人叫，不准别人叫，怕小狗对她疏远，对她没有感情。但洗澡、洒香水的任务却交给了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

1972年一天的傍晚，江青吃完饭，告诉护士赵柳恩，把她特意给小狗留下的饭菜用碗装好，放在楼门外，等她从大会堂开会回来喂狗。

小赵遵照江青的吩咐，把狗食装在一个碗里，并用菜碟盖好，放在楼门外。小赵是广西柳州市人，当时只有23岁，长方脸，中等个，大眼睛，白皙的皮肤，说话细声慢语，微笑时脸上出现两个小酒窝，口中露出两个小虎牙。她的动作文雅而得体，显现出一个典型的南方姑娘的温柔。可是她到江青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神经高度紧张，工作劳累，生活无规律，

休息、吃饭无定时，她的青春活力很快就不见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那天晚上11点，江青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要喂狗，小赵赶忙去取狗食，走出楼门，一看，不好了，狗食没有了，小碟子在一边，碗倒在一边。

原来是江青开会时间较长，回来的时间晚了，大概小狗实在太饿了，闻到饭菜的香味以后，循着香味找到了装狗食的碗，便把小碟子拱掉，不客气地把碗里的饭菜吃了个精光。

心情十分紧张的小赵，把狗食失踪的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江青。江青听了以后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其实，怒气已经充满胸膛。她故意假装心情平静的样子，把工作人员叫到楼门厅，叫大家围成一个圆圈。秘书、警卫员、司机、护士、厨师、服务员等，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个个都十分紧张，不知道江青又要耍什么花招，玩什么把戏。

过了一会儿，江青抱着小狗出了大门，然后把小狗放在地上，看小狗有什么反应。一开始，大家不明白江青的这一举动是什么意思，感到莫名其妙，可是一刹那间，都清醒过来了，都猜出了江青的用心。

原来江青是利用狗和人之间的感情来“破案”。她把小狗抛出去，狗奔向谁的身边，此人就是喂狗的“罪魁祸首”（江青特别忌恨别人喂她的狗，因为别人喂她的狗，会破坏狗和她的感情），——这，真亏她想得出。此时，只要小狗奔向哪位工作人员，她（他）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大家紧张得心快要跳到嗓子眼儿了，生怕小狗奔向自己。

江青刚刚把小狗抛出去，懂人性的小狗就立即转身奔向江青。她又把小狗抱起来，转了两圈（自认为植物神经衰弱的江青转了两个圈，也不喊叫头晕了），把小狗第二次抛出去，小狗又转身奔向江青的身边。

江青的拙劣表演，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弄巧成拙，便恼羞成怒地、恶狠狠地对小赵说：“喂狗的就是你！”

天哪，小赵的确没有喂狗，于是摇了摇头，为自己申辩了几句。江青见小赵竟敢当着众人的面“顶撞”她，便咬牙切齿地拉着长音骂道：“你不是喜欢狗吗？你就和狗一块儿滚吧！”当即命令我把小赵和狗一起连夜送到中央警卫团在半壁店的农场去。

同志们对江青这种恶作剧的表演，感到很气愤。可是，她手中掌握着置人于死地的权力，大家敢怒不敢言，只得委婉地替受委屈的小赵求情。

有人说：“今天是星期六，天又这样晚了，在农场的都是男同志，一个女同志去了没有地方住，今天就让小赵在这里住一晚上，明天再作安排吧。”

江青大声喊叫道：“不行，我说出的话是从来不会收回来的，赶快叫她走，她不是喜欢狗吗？让她和狗一起睡觉吧！”

当天晚上，我们不忍心把小赵送到一个陌生的农场去，就瞒着江青把她安排在钓鱼台17号楼二层一个房间休息。

把小赵安排好以后，同志们轮流给她送饭、送水，不让她下楼，以避免她和江青碰面。我们还告诉钓鱼台管理处的领导和在17号楼做服务工作的同志，千万为小赵保密，谁也别说不

赵在17号楼住。管理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非常理解我们的心情，也非常同情小赵的处境，共同保护着这个无辜的好同志。

小赵在17号楼躲了一个星期，委屈难过地痛哭了一个星期。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两眼红肿，面色憔悴，精神恍惚，眼泪哭干了，嗓子哭哑了，在极度难过的时候，就默默地站在毛主席像前，小声说：“我可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江青同志的事情，小狗不是我喂的，我是冤枉的呀！你老人家洞察一切，请你老人家快点救救我吧！”

江青鸿运当头，脾气古怪，同志们有多大的委屈，都是深深地埋在心底，谁敢向毛主席报告呢？即使是毛主席知道江青做了坏事，批评了江青，江青也会寻找报复的机会的。无奈，我们对小赵只能表示同情，耐心地去劝导和安慰，请她想开点……

江青反复无常，对此，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商量着做了第二手准备。江青是叫别人伺候惯了的人，别看她恼羞成怒之时，把小赵赶走了，不晓得什么时候又要叫小赵回来，因为小赵聪明、勤快、文静。我们想：如果江青叫小赵回去工作的话，问起小赵有关农场的情况，小赵肯定回答不出来，露了馅儿就更糟糕了。于是，我亲自开着汽车拉着小赵到中央警卫团半壁店农场看了一眼，并叫小赵记住该农场有多少人，种了多少棵树，养了几头猪等等。

果然不出所料，小赵离开10号楼以后的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江青觉得一个护士不够用，又命令小赵回10号楼工作。小赵一听要回到江青身边，立即毛骨悚然，执意不回。我又做小赵的思想工作，对她说：“咱们扭不过她，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回去的本身就说明你是无辜的。”小赵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一经劝说，也就想通了。

小赵回到10号楼之后，江青果真问起了农场的情况，小赵从容地一一作了回答，没有什么漏洞，这也使我心中的石头落地了。

我想，江青在处理小赵的问题上似乎是觉得自己错了，她叫小赵和狗一块走，又叫小赵回去工作，这似乎表示了一种姿态。但是，她这个人从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尤其是在工作人员面前，她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不认错，就更错。叫你走，你就走，不走不行；叫你回，你就回，不回也不行。

#### ◇ 利用组织生活会整人

我刚到江青那里工作时，毛主席、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是一个党支部（其成员也包括毛主席和江青），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任支部书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任副书记，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以及江青）是一个党小组。党的“九大”以后，经上级党委批准，江青处单独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当时，江青处支部共有党员11名，其中包括江青，同志们选我做支部书记。我们这个支部除了江青以外的其他10名党员，都是经过组织上严格审查、认真挑选去的，除一名特级厨师程汝明同志外都是部队中的年轻干部，大家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组织纪律观念都比较强，都能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都能按照党章的规定积极参加组织生活。组织生活的内容大都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汇报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江青虽然我们支部的一名党员，但是，从来没参加过组织生活会。她是一名特殊党员，每次召开组织生活会，我也不敢通知她。

有一天，江青突然决定要召开组织生活会，并告诉我她要亲自参加。江青的反常举动，使我摸不到头脑，后来才知道，护士小周被江青打成反革命，隔离审查以后，小周的“罪行”材料还没有找到。江青明白，只靠上海市那两位亲信提供的情况和江青自己捕风捉影捏造的材料

把小周打成反革命证据不足。如果小周的问题被毛主席知道了，问起来，她无法解释。

于是，她就挖空心思地想出一个办法，决定以组织的名义搞一份小周的所谓罪行材料。当天晚上8点许，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开始。江青以特殊党员的身分，坐在大家的面前，她用特殊的声音说：“今天的会议由我来主持，我有重要的话要说，你们都要注意听。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以前之所以没有参加过你们的组织生活会，是因为我的组织生活是在中央政治局过的，我参加的是高层次的组织生活会，要讨论重大问题，决定重大问题，和你们的组织生活会远远不是一个层次。我今天参加你们的生活会，你们应该感到光荣和自豪。以上是我要解释的一个问题。”

江青接着说：“我今天参加你们的生活会，主要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了防修反修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你们要知道，我是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有人说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过分。我的确是始终顶着巨大的压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阶级敌人对我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陷害我。你们的责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我，忠实地为我服务。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们别糊涂，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不好好为我服务，就是对党未尽到责任。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对我不忠，就是对党不忠。对我的态度问题，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而且是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对我的态度问题要提高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我是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林彪等人对我恨之入骨，可把我给害苦了。你们如果对我是忠诚的，听我的话，就要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林彪及其死党、爪牙们的罪行。”

江青停顿了片刻继续说：“你们如果揭发问题有功，我就犒赏三军。”

江青说到这里，拿起一块小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然后将小毛巾狠狠地用力往茶几上一摔，说：“如果有人知情不报，有意包庇坏人，后果你们是清楚的。”

接着江青顺手抄起一块大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说：“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我主要要说的话，就是那个小周的问题，你们不要为她表面老实的假象所迷惑，她可是林彪、邱会作派到我身边的坐探。你们在座的同志对党要忠诚老实和无限热爱，对林彪及其死党要无限地仇恨。一个‘爱’字，一个‘恨’字，这一字之差就清清楚楚地表现出了一个立场问题。如果要证明你们的立场是对的，是坚定不移的，你们就毫不犹豫地、勇敢地、认真地揭发那个小周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我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人。你们企图对我耍什么花招，想对我隐瞒什么，休想！在我出生入死对敌作斗争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论年龄，我可以生出你们来。”她看了一眼程汝明老厨师，又说，“老厨师傅除外。我再强调一下，你们如果不揭发小周的问题，你们今天晚上谁也别休息，谁也过不了关。我现在到办公室看文件，等着看你们写的揭发材料。你们可以大家发言，一个人作记录，然后整理成文。”

江青说完就拂袖而去了。

江青走了以后，由我主持会议，请刘真同志作记录。大家相视而坐，心情沉重，一个个发愣，谁也不开口说话，我觉得空气快要凝结了。大家都在想：今天晚上如果对小周不搞出几个“问题”来送给江青的话，肯定过不了这一关。可是，小周除了天真、纯洁、老实、勤奋，任劳任怨以外，还能有什么呢？她的品质和实际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谁能忍心往洁白无瑕的纸上抹墨呢？

就在大家紧张地思考问题的时候，江青接二连三地打铃催要揭发材料，给本来紧张的气氛又增添了几许恐怖。

我们10位共产党员，有老有小，有男有女，来自不同的单位，都受过党的严格训练，都富有正义感和一颗善良的心。大家一致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绝对不能昧着良心，违背党的原则，去陷害一位纯洁无瑕的好人。但是，如果我们给江青一个字不写，就过不了今天晚上这一关。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凑了个材料。现在回忆起来内容大概是：小周为人忠诚老实，能遵守纪律，团结同志，工作不怕苦累，爱学习，肯钻研，有一定的护理工作经验……缺点主要是性格比较脆弱（这句话的意思是小周受的委屈太多，有时哭鼻子，掉眼泪）。

当时大家委托小刘归纳同志们的意见，整理好以后，他念给大家听。念完以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对，就是应该对小周有这样一种评价。”

我是支部书记，这份材料应该由我交给江青。我拿起那份材料一看，很大的字还没有写满一张16开的纸。其内容又和江青想象的根本不同，她看了以后肯定通不过。但是它毕竟是以党支部的名义写成的材料，我硬着头皮也得交给江青。我来到江青的办公室，看到她的脸仍是阴沉的，我把材料递给她。

江青接过材料，仔细看过以后，阴沉的脸更加难看了：“这写的是什么东西！这哪是揭发材料？这不是给她评功摆好吗？我看你们是包庇她，合起伙来对付我！”她说着说着用力把材料摔在地上。

我一脸尴尬，出现这种情形是我预料之中，但当时我还是感到很难堪。我没有作声，准备挨批，如果作声，她会说我顶撞她，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引火烧身，保持沉默是唯一的自我保护、等待过关的好办法。

我知道，她的精力是有限的，她在会上大讲了半个多小时的话，又等了两个多小时的材料，精气神很快就消耗尽了。她也明白，张牙舞爪地吓唬了那么长时间，才看到了这样一份材料，再想向我们榨取她所需要的东西是很困难的。

沉默了一会儿，江青无精打采地说：“唉，材料就这样吧，这也有用。”于是，她自己没趣儿地弯下身去，把材料拣起来，锁进了她自己的铁皮柜内。

我走出江青的办公室，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走到门外往上一看，到天空中有几颗星星在眨巴着眼睛。心想：“这是唱的哪一出？共产党里面居然还有这样的戏……”

#### ◇ 骗政治局委员开会审案

1972年3月4日晚上，江青和往常一样，服了第三次安眠药以后，进入卧室准备睡觉。护士小赵（即赵柳恩）按照医嘱和江青的要求，把另一份安眠药放在床头柜上，以备江青万一睡不着时顺手就可以拿到自己服用。小赵按工作顺序一切做完以后，即回到护士值班室准备休息，此时已是5日凌晨4点钟了。

过了一个小时以后，江青突然打铃叫小赵。小赵赶紧进入江青的卧室，江青躺在床上阴沉着脸说：“今天晚上你为什么不给我放备份药？我只睡了一小时就再也睡不着了，想吃备份药，结果没有找到，你给我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小赵用肯定的语气说：“江青同志，那备份药我给你摆上了，是不是你吃了以后，忘记了。”



江青没有想到小赵会那样回答她，立刻火冒三丈，她说：“我肯定地说，是你忘记给我放了，我根本就没有吃，你竟敢撒谎说给我摆了，难道我一个政治局委员还诬赖你一个小护士吗？别解释了，快点把那份药给我拿来，否则我今天晚上睡不好觉你要负责。”

小赵作为护士，只能按照医生的嘱咐按时按量伺候江青服药，不可以擅自给她增加药量，要是出一点问题她也负不了责任。

小赵委婉地说：“我去问问大夫，看能不能再增加药量，如果可以增加的话，增加多少合适？”

江青一听火气就更大了，瞪圆眼睛吼道：“你一个小小的护士是听我的还是听大夫的？这根本不是增加药量的问题，而是少我一份备份药，是叫你给我补上。”

小赵非常为难，不听江青的不行，不请示大夫出了问题又负不起责任。她赶紧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请示大夫，经大夫同意，又适当增加了一点药量，然后伺候江青服下，江青才平静下来。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了，实际上是暗潮汹涌，江青由于长期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就有了很强的抗药力，她的睡眠是靠服用超剂量的安眠药维持的。她服一次安眠药的剂量，足够没有服过安眠药习惯的人睡上一两天的。物极必反，那天晚上江青连续服了5次安眠药，不但没有入睡，精神反而兴奋起来，用她的话来说这叫“抗劲了”。出现了这种情况，感觉自然不舒服。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各种疑问涌上心来，想来想去，她开始怀疑小赵是受了小周的指使给她吃了毒药。

江青在床上实在躺不住了，就打铃起床。与往常一样，小赵给她穿好了衣服，帮助她吃了麦片，洗漱完了，江青走到办公室，横眉竖眼地问小赵：“我问你，你是从什么地方调来的？”

小赵说：“是从305医院调来的。”

江青又问：“在305医院以前你在哪里？”

小赵说：“在广州军区。”

江青听小赵说以前在广州军区，就捕风捉影地说小赵是黄永胜的人（因为黄永胜任过广州军区司令员），于是就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吼叫：“原来你是从广州军区来的，是黄永胜把你派到我这里来的吧？”说着伸手就把小赵领章帽徽撕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并大声说：“你不配戴这些！”

江青折腾小赵到晚上9点钟，把我叫去，命令我立即打电话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马上到17号楼开会。江青总是这样，利用她是毛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经常惊动除毛主席和林彪以外的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

3月初北京的夜晚春寒料峭。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接到江青办公室的电话，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先后赶到钓鱼台17号楼。已经70多岁的周总理和叶剑英老师也来了，一共来了8位政治局委员，即：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

17号楼大厅的北侧摆着一排长条会议桌，政治局委员顺着长条会议桌一字排开坐下。周总理、江青坐在中间。

他们都坐定以后，江青突然把目光盯向我，并大声叫唤：“小杨、大周、小赵给我过来！”我们走过来按照江青的指令坐在他们的对面。

除江青以外的8位政治局委员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江青要干什么。

等我们坐下以后，江青大声对我质问道：“姓杨的你站起来。我问你，你要老实回答，林彪的坐探小周是怎么调来的？你说！”

我站起来回答道：“工作人员的调动是上级组织上的事，小周是怎么调来的我不清楚。”

“你给我坐下！”江青命令道。

然后江青又指向大周，“大周，你给我站起来，你说，她们为什么让我吃这么多安眠药？你说，你说！”

大周解释说：“给你服的药量大小是医生和你商量决定的，我不了解这个问题。”

江青碰了两上软钉子以后，开始把矛头指向小赵：“小赵，你给我站起来。我问你，你给我吃这样大剂量的安眠药，是不是小周指使你干的，你今天给我老实回答，不许隐瞒事实。”

小赵毫不含糊地说：“确实不是小周指使的，吃多少药是医生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你商量定的。”

小赵刚回答完，江青又大吼：“你，你给我坐下！”

江青对我们3个人发难了一遍，没有问出她需要的东西，火气越来越大，一下子站起来，不知又要审问什么。

这时表情严肃的周总理看到江青这样飞扬跋扈地对待工作人员，实在忍不住了，很气愤地对江青说：“你不能对工作人员态度好一点吗？你用这样的态度问话怎么让人家讲话？我都紧张了，他们都是孩子还不紧张？听说你把小赵的领章帽徽撕掉了，我都替你脸红。”周总理说着转过头去说：“张大夫（总理的保健大夫叫张佐良）快给我一点药吃，我的心情太紧张了。”

张大夫忙从药箱里取出药给总理服下。

叶剑英见出现了这种情况，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也想将江青一军，他把江青经常服用的安眠药单子拿过去看了看，说：“你服的安眠药确实是‘毒药’，药的剂量也的确太大，你今后不吃不行吗？”

“不吃睡不着觉。”江青说。

“那少吃点行不行？”叶剑英又问。

“少吃也不行，因为我长期服安眠药，有了很大的抗药力了。”江青摇头摆手地说。

叶剑英听江青说安眠药不吃不行，少吃也不行，全都明白了。他站起来，走到一旁坐在东边的沙发上，头往沙发靠背上一靠，合上眼睛，呼呼地睡觉去了。经常和江青一拍即合的张春桥、姚文无，见周总理批评了江青，又见叶剑英同志将了江青的军，也不敢给江青帮腔了。

江青见没有人同情她、支持她，感到很尴尬，想挽回面子，于是就说：“你们都知道我有病呀，我现在该吃药了。”

她指着刚刚被审讯的小赵说：“快给我药吃（她要的还是安眠药）。 ”

江青吃完药，悻悻地离开17号楼大厅到礼堂看电影去了。

周总理见江青走了，把叶剑英、汪东兴叫到17号楼的小客厅商量如何处理今天发生的事情。

总理说：“今天江青把我们这么多政治局的同志叫来，对几位工作人员兴师问罪，我认为这

是一件大事，应尽快报告毛主席，不报告不好。”

汪东兴说：“我赞成总理的意见，今天晚上发生的事，确实是一件大事，如果不报告毛主席，万一出了更大的问题，我们不好交代，请总理在方便的时候报告主席。”

总理沉思了一下说：“主席工作和休息的时间我不好掌握，东兴同志每天都在主席那里，还是请东兴同志报告主席比较方便。”

叶剑英也说：“还是东兴同志报告主席好。”

汪东兴说：“尊重周总理和叶帅的意见，同意由我向毛主席报告。”

周总理对汪东兴叮嘱：“请你报告主席越快越好。”

汪东兴说：“那好吧。”

第二天，周总理又给汪东兴打电话，催促他赶快报告毛主席。

汪东兴根据周总理和叶剑英的意见，及时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了汇报以后，非常气愤，他说：“江青私设公堂，要拿她问罪。”江青疯狂地折腾了一天一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弄得她非常尴尬和狼狈。午夜时分，她由张春桥、姚文元陪同到礼堂看了一部电影，又和往常一样，服了3次安眠药以后回到10号楼休息去了。

江青进入卧室以后，我给她准备好了第二天要看的文件，回到我的宿舍。

我躺在床上，深深地出了一口气。回忆当天江青的表演，心中又气愤，又高兴。为什么气愤？毋庸赘述。高兴的是，江青平时虐待、折磨工作人员的情景，中央领导可能听说过，并没有亲眼见过，今天这么多政治局委员看到了江青是怎样对普通工作人员的，知道了我们在那里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周总理和叶帅当着众人的面严肃地批评了江青，给我们撑了腰，出了气，这对我们是极大的安慰。我想着想着，激动的泪水顺着眼角流到了枕头上。

今天的一切就这样过去了，明天是凶是吉，难以预料。

第二天上午11时左右，江青在卧室打了一下电铃，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江青起床时先叫护士，护士进去以后帮江青穿衣服和鞋袜、洗漱、吃东西。而今天起床为什么只打了一下铃？都认为是她打错了铃。护士就端着江青起床要用的洗漱和要吃的东西进了江青的卧室，没有多大一会儿，护士出来对我说：“老杨，江青是叫你的，你快进去吧。”

“江青起床了没有？”我问护士。

“她还没有起床。”小赵回答。

“她现在叫我进去干什么？真奇怪！”我是问小赵又是问自己。

“我哪知道，叫你去你就去吧，你还得快点儿去，看样子她还很着急。”小赵说。“我现在进去不方便，请你跟我一起进去吧。”我恳求小赵。

“那好吧。”小赵爽快地同意了。

小赵走在前，我走在后。进入江青的卧室，我看到她穿着睡袍半躺半靠在床上。她看见我进去，突然坐起来，双手向我伸过来，看上去面色很疲倦，情绪很激动，头发很乱，脸上的肌肤在颤抖，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种样子，吓了一跳，不由倒退几步。这时，她做着手势，连声说：“你过来，你过来，离我近点儿。”我看她那种异样的动作和表情，还是不敢靠近她。

她又说：“没有事，你过来呀！”

我想：现在有护士在场，看她还要耍什么花招，我一个男子汉，她不敢对我下毒手吧？走近点儿就近点儿。

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她一下子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声说：“我昨天晚上惊吓了你们啦，惊吓了你们啦！”

我见此情形，一下子愣住了，江青今天的态度和昨天判若两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个晚上就能使她良心发现，改变了态度？我在江青那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对她还是了解的，江青不可能是这样子，她一定又有什么花招，她或许只是换了一个手法。一招不行又来一招。这时小赵看没有她的事了，想离开江青的卧室，我忙给她使了一个眼色，不让她离开，她心领神会，没有离开。

江青皮笑肉不笑地说：“我想给主席写封信，可是我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说你写。”

江青这么一说我完全明白了，她是假装给我们道歉，实际上是为了叫我代笔给毛主席写信。

江青眯缝着眼睛说：“主席：我长期遭受林彪一伙的迫害，他们指使在我这里的坐探叫我服了大量的毒药，使我植物神经严重失调。我现在嘴唇青紫，手脚发麻，头发脱落，好似干柴……请主席为我作主……”

我写完以后，江青拿过去改了几个字，又叫我抄了一遍，她签上名，写上年月日，又叫我拿了一个大信封，她在信封上写上：

即送主席、总理、剑英、先念、春桥、文元、登奎、吴德、东兴同志亲启。

江青写完以后，亲自用密封签封好，叫我立即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马上派通信员来取，并命令他们由专人于当天传到中央领导同志手中。

江青写这封信的目的很明确，是想请毛主席表态，用毛主席的威望和影响把秘书、警卫员、护士等工作人员打成现行反革命，向中央领导同志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

由于毛主席已经知道了江青私设公堂向工作人员发难的情况，所以江青的信送到主席那里，主席看过以后连圈都没有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接到信以后，见主席没有画圈，看过以后也都没有画圈。

信转了一大圈，退回江青，她显然看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看过信以后都没有画圈，遭到了冷遇，有些不高兴，但她还是把它当做宝贝一样，锁进她自己的保险柜里。

过后不久，有一天汪东兴和我一起议论这件事。汪东兴说：“那天江青打电话通知8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17号楼，总理打电话给我，问：‘江青同志叫我们去有什么事，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们去了以后，江青说：‘杨银禄、周金铭、赵柳恩有问题，一是要对他们进行审讯；二是叫公安部把他们抓走。’总理说：‘你认为工作人员有什么问题，我们不能对他们进行审讯，而应该叫谈话。’江青不同意叫谈话，坚持说应该叫审讯。我说，你的工作人员是由我代表组织经过精心挑选、严格审查派来的，平时由我负责领导，你如果认为他们有什么问题，应该交给我，由组织调查处理，不能一下子交给公安部，等我们谈了话以后，再由组织酌情处理。江青还是坚持不同意叫谈话，而叫审讯。那天，江青当着我们8位政治局委员的面张牙舞爪，杀气腾腾，审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那是私设公堂，侵犯人权。她表面上是对工作人员的，

实际上是对准我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嘛。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场问了江青几个问题，江青回答：‘不吃睡不着，少吃也不行，因为我长期服药，有了很大的抗药力了。’叶剑英同志听了江青的回答，不再说话了，头往沙发上一靠睡觉了，还打出了鼾声。我小声问叶帅，这样紧张的气氛，你怎睡着了？叶帅小声说：‘我没有睡着，我是装睡着了。她这样闹，我们不该来。’我说，我们事先不知道她叫我们来有什么事，总理也不知道。叶帅说：‘真糟糕！这不是为江青助威嘛。’叶帅说得对，是为江青胡闹起了助威作用；但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坚持了原则，才使江青的阴谋没有得逞。”

我跟汪东兴说：“我们工作人员真是太感谢各位中央领导同志了！”

□ 《文史精华》 2009年第8期

~~~~~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五）

• 舒 云 •

28、胡萍给林彪派专机怎么能算“资敌罪”？

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培养的第一批优秀飞行员，空军第一个给毛泽东开飞机的机长。胡萍空中生涯20多年，是空军专机的元老级人物，他长期担任空军34师师长。1969年调到空军司令部担任副参谋长后，仍分管空军34师，并担任空军34师党委书记。胡萍为专机事业操碎了心，他飞专机、管专机从来没有出过事，没想到却被突然的九一三事件狠狠绊倒了。

1971年9月13日早晨，九一三事件刚发生几小时，吴法宪揭发说：都是胡萍这小子干的。所以九一三事件第一个被关押审查的就是胡萍。胡萍坦然地说：你们尽管查，要查出是我制造阴谋，我负一切责任，我并不知道阴谋。我不是想当官的人，我更喜欢飞行业务。我承认我有私心，怕打倒，怕站错队，可是话说回来，又有哪一个人愿意被打倒？又有哪一个人不希望保住晚节？专案组不听胡萍申诉，说不可能不知道，你当了反革命还不老实。1982年3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判决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为林彪提供飞机，造成严重后果，被判为“资敌罪”，有期徒刑11年。

给林彪派飞机怎么能是算“资敌罪”？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制约，此时林彪是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是上了党章的毛泽东“接班人”，“亲密战友”，并不是敌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专门交代，林家要用飞机，要全力保证，而且要秘密。林彪儿子林立果坐飞机到北戴河，根本不可能告诉胡萍他要叛逃。当周恩来通过吴法宪查问三叉戟，并要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北京。胡萍并不清楚这中间的严重后果，他以为是吴法宪捣鬼。胡萍回忆：庐山会议很紧张，但我不知道细节，林立果让周宇驰跟我们说吴法宪在庐山怎么不好，要我们警惕他，不要跟他走，那时刘少奇还说倒就倒，更何况我们。他们玩了圈套，现在想可笑，不能离开当时的时空。林立果利用我，空军干部部副部长何汝珍对我说，叶群问他，胡萍这小子靠得住靠不住？何汝珍说，这个你放心，绝对没问题。我想为什么叶群问这个？心想跟他们打交道要小心。因为九届二中全会后，很多人都知道吴法宪犯错误了，空军以“反吴”和“保吴”划线。所以我通知周宇驰，总理查飞机了。但这一切都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这是“好人犯错误”，而不是“坏人办坏事”，这怎么能叫“资敌罪”呢？

审问胡萍，说逃跑是他主谋，就挖这个。胡萍说：我可以派飞机，但我怎么知道他们往哪里跑？我没有什么交代，确实不知道，我编也编不出来。查我，我也不知道谋害毛泽东。那时我在301住院，左肾怀疑癌症，切片检查，发现是结核。本想马上手术，又想还是等凉快点再做。我住院没什么事，就等手术。1971年9月8日晚上，林立果从北戴河回来，到候机室，周宇驰也在。林立果从兜里拿出林彪手令让我看。飞机要移动，几个关口，必须经过调度室批准，才可以放飞。他们也知道用飞机要从我这里过，但他们搞什么名堂，我不知道。9月12日午睡后我回机场。18时多，周宇驰打电话，林立果要到北戴河，点名要256三叉戟。去北戴河正常，林彪在那里。我打电话给飞行员潘景寅，潘景寅不在，我又给第一副驾驶陈联柄打电话，由他转告。本来三叉戟应该牵引到候机室门口，林立果不让，说我们开车过去。主要怕浪费时间，他们都安排好了，直接到停机坪。我没过去，后来听说他们拉了很多东西，搬上了飞机。

9月12日夜里，吴法宪对我说，准备两架飞机去北戴河，没说谁去，我以为吴法宪去。后来我发现杨德中腰里别着枪，我才想有点问题了。已经把吴法宪看出来了，他去北戴河可能性不大。我一直有问号，后来才知道是周恩来准备去。

256三叉戟飞出去，我很奇怪，不是航线。我还在想，他出国干什么？肯定是雷达报错了。9月13日，我准备回医院，我有车，可吴法宪说，用我的车，张秘书送你。实际上监视我，怕我跑了。李德生问吴法宪怎么回事？吴法宪说，都是胡萍这小子干的。林彪走前，吴法宪交代过准备飞机，李文普也打过招呼，过去都是这样办法，一出事，都推了。没上边指示，我敢作主吗？伊尔-18拉警卫，一架拉汽车，两架直升机，用于视察，林彪一出动，都是这样，这就五架，还有一架空飞上海，我不知道要接谁。非说你搞阴谋，我为他们辛辛苦苦服务20多年，谁知他们搞这玩意。硬说三叉戟飞苏联的阴谋是我搞的。周总理为我说话，说不要追了。杨德中是公安部九局副局长，我与杨德中关系很好，他来看我。第二天专案组说，你要老实点，不要以为总理给你说好话。周总理不死，他一清二楚，了解我，我的结局会好点。那天早上就把我关起来，杨德中把我送到中央警卫团的营部，住两夜，送亚疗。总理说了，让你好好揭发黄吴。我没头没脑，什么黄吴？我一字没写。又住两天，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念文件，我才大梦初醒，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根本不知道是阴谋，出了事，没理可讲，我说有什么用！

## 29、九一三事件中禁空令是什么时间下达的？

中共中央在处理九一三事件中有两个禁空令，“禁飞”和“禁空”。第一个禁空令是“禁飞”，只是一般通知，周恩来的“禁飞”令还不是那么严格，起码256三叉戟还可以起飞。周恩来的第二个禁空令是“禁空”。当256三叉戟飞越国境时，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下达禁空令，不准任何飞机起飞。同时全军紧急战备。并要各军区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指挥，避免再有飞机外逃，或有人调动飞机轰炸北京。

“禁飞”令只是针对停在北戴河的256三叉戟。周恩来打电话给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让他查海军山海关机场是否有一架三叉戟。核实后周恩来命令，山海关这架飞机要起飞，如起飞，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六人的命令。此时周恩来在军中并无职务，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军队下达命令，如果没有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特别授权，再借给周恩来几个脑袋他也不敢。坊间关于联名还有另两个版本，一个是五人联名，一个是四人联名，总之是联名吧。

空军作战部值班参谋朱秉秀解释：有没有“林”，他记得很清楚。因为是朱秉秀负责向下传达的，肯定有“林”。因为向下传达，涉及成千上万的人。如果没有“林”，事情马上就会暴露。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也接到了周恩来的“联名”命令。朱秉秀回忆：周总理命令吴法宪要停在北戴河的三叉戟飞回来。因为说三叉戟有故障，周总理命令吴法宪，三叉戟停在山海关那里，待修好后立即回来，不准带任何人来北京。周总理又在电话里命令吴法宪，决不允许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有飞机来，你我都要掉脑袋。

吴法宪命令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打开所有的雷达，决不允许飞机飞到北京来。

2 5 6 三叉戟飞越国境时，周恩来下达“禁空”令。同时周恩来今天晚上的各种飞行都停止，包括部队的夜航训练。

吴法宪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打电话给空军指挥所，让通知各军区空军、指挥所立即停止各种飞行。吴法宪还亲自把周恩来的“禁飞”令传达给北京军区空军、沈阳军区空军。因为1969年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这是中国军队防范的两个重要方向，其它军区空军由空军指挥所传达。

朱秉秀回忆：那时空军指挥所里很有意思，你注意观察，副参谋长白云代理梁璞在指挥所，没事人一样，特别轻松；梁璞来得晚一些，也“趾高气扬”。

朱秉秀没有提到副参谋长王飞，王飞是后来到指挥所的，白云说他没有在指挥所看见王飞，王飞肯定是去了。当时江腾蛟打电话给王飞，想问问怎么回事，王飞着急地说，我在指挥所，我在指挥所。王飞心里有“鬼”，话都说不出来，手直哆嗦。

朱秉秀回忆：我虽然不知道三叉戟上有谁，心里还是有点数。当然不敢往林彪身上想，想党办那一伙人，那时还不叫“小舰队”，叫调研组。我们是中间派，看他们两派斗。后来直升机起飞，西郊机场报过来，是周宇驰和于新野，这就更清楚了。

3 0、2 5 6 三叉戟强行起飞，李作鹏何罪之有？

特别法庭副庭长伍修权说：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我们抓的是九一三事件中，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机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中说：在9月12日晚11时35分和13日零时6分，李作鹏两次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下达命令。12时多，周恩来接到张耀祠的报告，林彪已经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去了。周恩来询问派出的部队能否先到机场，张耀祠不能肯定。周恩来再一次叫李作鹏命令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零时20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已经发现当时情况异常，打电话给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这时李作鹏仍然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

李作鹏在法庭上坚决不承认这一条罪状。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没有给256三叉戟起飞令，256三叉戟是强行起飞。李作鹏是海军第一政委，远在北京海军大院，按工作程序应该是山海关机场制定阻止起飞的措施，上报李作鹏批准。如果李作鹏不批准山海关机场的阻飞措施，当然应该由李作鹏负全责。可是，山海关机场包括已经到机场的八三四一部队，都眼睁睁地看着256三叉戟晃悠悠地起飞，束手无策。

而李作鹏只是原原本本地向机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这有什么错？更何况周恩来告诉李作鹏传达“四人”联名命令时一点风声也没有透，没有告诉李作鹏山海关的“风云变幻”，林彪想

去哪？全没讲。谁能想到林彪飞机跑到国外？想都不敢想。李作鹏的大儿子李冰天说：如果李作鹏事先知道出这样的大事，他还有心思在海军种“自留地”？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也根本没考虑问题的严重性，他只是照本宣科，一字不差地把总理指示传达给山海关机场。如果周总理哪怕多透露半句，李作鹏也会给山海关机场强调得更多。以后李作鹏在关押期间给周恩来写了三四封信，全都石沉大海，周恩来生前没作任何解释。当然，一种可能是周恩来没收到李作鹏的信，被专案组扣下了。另一种可能就是周恩来根本没法解释，只好沉默。以后李作鹏给很多军史研究者说，以他在法庭上最后陈述的四个半小时录音带为准。

这里有个问题，李作鹏是海军政委，虽然他也是副总参谋长，但调飞机这一类的事情应该归海军司令部，再往上应该是海军司令员管，李作鹏为什么直接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让秘书办不行吗？或者让司令部通知？你只是一个政委，也不是司令员，军事指挥上没有你的事。但李作鹏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因为是周恩来亲自通知的，责任重大，所以李作鹏亲自通知山海关机场。

电话由李作鹏、李作鹏夫人董其采和朱秘书三人记录，核对后，还特意给周恩来复诵了一遍。复诵时用的是董其采的记录稿，周总理肯定地回答“对”，传达也是按这个记录稿念的。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时，李作鹏已经吃安眠药睡下了。处理完给山海关的电话，他接着又吃了安眠药，这一次睡得比较踏实，后半夜被叫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还没睡醒。但一听说开会，他马上清醒了，政治局从来没有在后半夜开过会，是不是与昨天晚上总理那个不让飞机起飞的电话有关？

中共中央〔1972〕24号文件第十八条，是关于李作鹏篡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说李作鹏两次篡改中央关于“联名”的命令，将四人指示放飞才放飞，篡改成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

在法庭上，李作鹏不承认“篡改总理指示”。但机场几位当事人都说他“篡改”了，成了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飞机起飞。之后李作鹏打电话要山海关机场值班员修改值班记录，值班员坚持不改。李作鹏又将山海关机场电话报来的值班日记，亲笔加以篡改，另行誊抄，报送中央，掩盖他篡改中央命令的罪行。

李作鹏在中共中央〔1972〕24号文件这一张纸上批：根本无此事。我向周总理报告原文为什么不敢发表？李作鹏在影印的“值班日记”边上批：这是（我的秘书）刘继祥同山海关机场进行校对的记录，他报告我，与我修改处相同，可以同刘继祥当面对证。

可是庭审时，却不允许李作鹏的秘书刘继祥出庭。

2009年我采访了刘继祥，他说中央24号文件的这个电话记录稿是我写的。1971年9月14日海航五师师长张兆龙从山海关机场电话汇报，我接的。张兆龙是飞行员出身，他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从师部坐火车赶来的，所以电话报告结结巴巴，我说这样不行，你整理一个稿子，给我念，我记录后报告首长。下午张兆龙组织人整理好稿子，他一字一句念，我记录，然后我念给李作鹏听。我念到第一次李作鹏电话指示，李作鹏和董其采都没有动作，而念到第二次李作鹏指示时，李作鹏和董其采都从沙发上跳起来，说不，不是这样说的。这才在我的记录稿上有改动。

一人放飞和四人放飞，很可能在电话里有误解。



其实这本来不算什么。

因为实际上，不管是“一人”还是“四人”，都没有让飞机起飞。

换句话说，如果林彪要起飞，李作鹏拦得住吗？既然是关系到副统帅，你周恩来为什么不亲自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既然让李作鹏通知，为什么不告诉事情的来龙去脉？为什么吴法宪知道情况，不与李作鹏通气？如果命令林彪的警卫部队拦截，一百个林彪也走不成，为什么不命令？

一大堆问号堆在心里，李作鹏坚决不承认三叉戟起飞的责任应该由他承担。其实，山海关机场的跑道灯没有打开，调度室也没有给起飞指令，256三叉戟是强行起飞。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四个人都没有让飞机起飞。但罪名还是加在了李作鹏的头上。

（未完待续）

□ 选自舒云\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y2222196>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